

# 走出“全景叙述”：全面抗战时期 企业内迁研究中的方法论反思\*

王鑫 郭雨萱 王海英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的企业内迁和后方工业发展是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围绕该主题的研究进路展开方法论反思。首先，针对现有以“全景式叙述”为主的文献，区分事实性描述与因果性推断两类问题，发现前者已形成较稳固共识，而后者缺乏对竞争性假说的系统检验。其次，采用文献梳理与比较评述的方法，沿着“是什么—受何影响—影响何在”的脉络，汇集并规范化列示若干核心竞争性命题，并从方法论层面对“解读传统”与“解释传统”的适用边界与互补性进行评估。最后，本文得出三点结论：其一，关于全面抗战时期企业内迁阶段划分、兵工与民营企业内迁路线差异以及西部工业化版图的事实性叙述已较完善，后续贡献主要在微观个案与区域—行业层面的细化；其二，关于战争需求、统制政策与基础设施投入是否对后方工业发展产生长期影响，现有证据仍显不足，有待借助数据化史料、县域数据库与严格的识别策略进一步验证；其三，未来研究应以问题为导向，推进动态视角与跨学科融合，实现“解读—解释”的范式整合，从而对抗战时期工业化经验给出现代意义上的因果阐释与机制刻画。

[关键词] 抗战时期 企业内迁 后方工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461(2025)09-005-15

##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至今，许多学者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经济，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随着一大批学术论文和专著的问世，对之前研究工作的总结愈发具有价值。从已有文献看，黄逸平和李娟（1993）、吴景平和王征（1999）、郑起东（2008）做的综述工作最具代表性。虽然三篇文

\* 作者简介：王鑫，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郭雨萱（通讯作者），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王海英，兰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外生冲击、人力资本积累与地区经济发展：基于历史自然实验的证据”（72463033）；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工业化与人力资本积累——基于三线建设的研究”（24YJA790068）。

章的发表跨度长达 15 年，但其论述结构与研究范式基本保持了一致。从结构安排上来看，上述学者几乎都先把抗战时期的中国划分为国统区、沦陷区和抗日根据地三大地区，然后将对应的文献填入其中。<sup>①</sup>黄逸平和李娟（1993）、吴景平和王征（1999）在分区的论述中总结了学者们关注较多且有广泛争论的问题；郑起东（2008）认为仅有分区的角度无法涵盖所有抗战时期的经济研究，因此增加了中日经济战、中外经济关系、国共经济政策比较等专题加以讨论。三篇文章皆属于大而全的研究范式，其引用的文献几乎涵盖了此前出版的所有重要史料汇编、专著和论文。这种全景式的论述让我们对相关研究有一个总体把握，但也正因如此，使得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不够深入。如本文所关注的工业企业内迁等问题，在这三篇综述文章中均有所涉及，然而限于篇幅，学者们都没有就此展开更加深入的分析与讨论。我们认为，将综述的范围大幅度缩小是展开深入讨论的必要前提。目前对抗战时期工业企业内迁专题的研究已有许多成果涌现，对其进行综述有着重要的学术史价值。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企业内迁的相关研究；第三部分介绍民国时期学者对企业内迁的相关研究；第四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后学者们对工业内迁及其影响的研究；第五部分进一步探讨了在不同范式下的研究方法和特点；最后一部分是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二、企业内迁：组织过程与案例

1937 年 7 月 7 日后，大量沿海的工业企业迁往后方以躲避战争。关于工业内迁过程最早的文献之一是林继庸（1942）的《民营厂矿内迁纪略》。该书详细记载了民营工厂迁往内地的整个过程，包括迁移的路线、运输工具的选择以及内迁的企业数量和机料重量等等。严格说来，该书更应该算作史料而非研究。林继庸本身是民国政府关于抗战时工业内迁的重要组织者，所以《民营厂矿内迁纪略》更多的是一种记录，具备的是史料价值。然而，该书在研究方面仍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首次为全面抗战时期企业内迁划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 1937 年 8 月至 1937 年 11 月、1937 年 11 月至 1938 年 10 月、1938 年 10 月至 1940 年 6 月。后继的学者在研究工业内迁过程时，都或多或少以该划分方法作为参照。第二部重要著作是孙果达（1991）的《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相比《民营厂矿内迁纪略》，该书的内容更加丰富，对事实的描述也更加详尽；此外，该书首次梳理出内迁四川、广西、湖南等地的工业企业名录，其内容包括厂名、原设地点、内迁地点、复工日期、主要产品和备注，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更加细致的抗战工业内迁图景。可以说，这两部著作对抗战时期企业内迁的组织过程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概括，后续的相关研究大都是在细节上对其进行补充，例如黄立人（1994）、魏宏运（1999）、薛毅（2005）、张守广（2012）等学者的研究在涉及民营企业 and 资源委员会企业内迁组织经过时，与

---

<sup>①</sup> 就实际内容来看，黄逸平和李娟在《抗日战争时期经济研究评述》一文中专门探讨了“孤岛经济区（上海租界）”的情况，而并未在文中涉及抗日根据地的相关内容。但这并不妨碍作者认同分区域的研究框架。作者自己指出，之所以没有涵盖抗日根据地的相关文献是因为魏宏运先生已有《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评述》一文，故不再赘述。

前人的成果并无太大差别，唯一的例外是兵器工业。对于这一战争时期最重要的工业，兵器工业内迁的组织过程与民营工业和资源委员会企业皆不相同，这主要是由于管辖机构不同所致。民营企业的内迁组织由迁移委员会负责，而兵工企业则是受兵工署管辖。黄立人和张有高（1991）较早研究了兵器工业的内迁经过，发现兵工企业的内迁高潮要晚于民营企业，这主要是因为战事激烈，内迁兵工厂会减少前线的军火供应。戚厚杰和王德中（1993）、戚厚杰（2003）则对各兵工厂的迁移路线进行了更详尽的描述。如果我们只关心抗战时期工业企业内迁最主要的脉络，那么无疑是从战前的工业中心上海到战时的工业中心重庆的空间转移，然而这并非企业内迁的全貌，一些位于东部沿海其他省份的企业也在战争爆发后完成了内迁，只不过其内迁的地点除了大后方以外还包括本省份的西部地区。张根福（1999）研究了浙江各地企业（主要包括杭州、温州、金华和永康等）迁入丽水地区（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的情况；黄菊艳（2000）考察了广东省营工厂的内迁情况，发现由于产权变更、利润损失以及设备拆运困难等原因，虽经济部多次督促迁厂，但绝大多数省营企业并未及时迁出，损失惨重；游海华（2017）则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整个东南区域，并详细介绍了浙江、广东和福建三省工厂的内迁经过。

工业内迁中的代表性企业也得到了学者们的更多关注。孙果达（1991）特别详细地介绍了刘鸿生企业、大鑫钢铁厂、大中华橡胶厂、中国化学工业社等工业企业的内迁经过；张守广（2015）考察了资源委员会所属中央钢铁厂和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内迁经过；薛毅（2005）详细讨论了由英国福公司和河南中原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经营的中福煤矿的内迁过程。除了专门的论文，一些传记史料也记载了典型企业的内迁经过，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包括《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荣家企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范旭东企业集团历史资料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原化工厂卷》（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民生公司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宝鸡申新纺织厂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阎锡山与西北实业公司》（山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林继庸先生访问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等等。

孙果达（1991）以工矿调整委员会的成立为界，认为前期国民政府对民营工厂的内迁工作是全力以赴，后期则是多方限制、消极怠工。在内迁过程中，官僚资本还对民营工业进行了无情的掠夺，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后果（孙果达，1985；张守广，2015）。张守广（2015）发现厂矿的内迁以国营工厂为主、民营工厂为辅，同时大型民营厂矿在内迁过程中表现被动。另外，内迁工作十分仓促，导致广东、山东、山西等地企业未能及时迁出。江满情（2009）认为民国政府的内迁政策经历了从劝导、资助到强制的转变，工厂内迁的范围也由机器五金工业扩展到纺织工业。此外，对内迁工作的评价不仅要考虑政府的组织，还应考察民营企业的迁厂态度。方显庭和顾浚泉（1941）与任扶善（1940）则强调了人力资本的作用，称未把沿海地区熟练的技术工人迁往内地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在抗战时期工业企业内迁工作中存在诸多失误之处，但学者们还是高度评价了参与内迁的企业家和工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认为内迁工厂确实为后期的抗战保留了实力（诸葛达，2001）。

### 三、亲历者的现状研究：政策与事实

1949年之前的学者大都直接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动荡，其研究的目的多为挽救民族于危亡之际，故这些文献大都倾向于提出如何发展国家工业的具体政策，当然，这也许和研究者们的政府背景有着一定的关联。首先是经济政策，以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1940）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战时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是：（1）增加军需生产，提高国防能力；（2）增加出口，提高对外支付能力；（3）增加日用品生产，安定人们生活；（4）发展工矿业，奠定工业化基础。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上，有学者提出坚持实施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张国瑞（1939）与罗敦伟（1940）则对战时西南经济建设与计划经济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论述。除了纲领性政策，工业布局是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问题，这或许是战前中国经济太过注重沿海，而这些发达地区的沦陷使得抗战局面被动所致。综合已有的文献来看，学者们的观点比较一致，那就是工业布局除了经济考虑，还应该有国防考虑，同时，不同工业的区位选择还应该和当地的资源禀赋相匹配（吴景超，1943；齐植璐，1943；李承三，1943；张肖梅，1945）。最后我们单独列出刘大钧的观点。作为民国时期最出色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工业建设方针主要是对重工业与轻工业、集中与分散、工业与农业、现代工业与手工业等四对矛盾的阐述分析后得出的。其见解的深刻之处在于，不仅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哪怕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乃至现在），都是我们发展工业所必须面临的课题。鉴于篇幅，仅列出刘大钧（1942）对轻重工业的观点：战后世界是以和平为主，我国也无侵略他国之心，故应以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相关的轻工业为主。

与政策研究相呼应的是现状研究，即弄清战时后方工业的发展状况到底如何，当然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影响力较大的两部著作是《中国战时经济志》（沈雷春和陈禾章，1941）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谭熙鸿，1948）。稍有区别的是，前者考察了战时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政策、经济动员、金融政策、贸易状况、人民生活之诸多方面，其中第四章“产业动员”有专门讲到工业发展状况；相比之下，后者写成的时间已至抗战结束，故对抗战时期的经济描述更为系统全面。更为重要的是，《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对各细分工业部门，如棉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电力业、冶炼业等有着详尽的介绍，是了解当时工业情况的重要史料。另一重要学者是身为战时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人员的李紫翔，其所著《大后方工业的发展》（1945年）、《大后方的民营工业》（1946年）、《大后方的国营工业》（1946年）、《战时工业资本的估计与分析》（1945年）、《大后方战时工业鸟瞰》（1945年）、《我国战时工业生产与前瞻》（1945年）皆是在详细的统计资料基础上展开分析，可谓最早期的量化研究。这些数据分析可以避免作者的主观偏好，有利于我们了解战时工业发展的真实情况。除了上述综合性较强的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专门讨论了战时后方的特定产业，如机器工业（马雄冠和叶竹，1943；欧阳仑，1948）、钢铁工业（王子祐，1942）、电器工业（郭德文和孙克铭，1946）、电气业（孙玉声，1946）和化学工业（顾葆常，1948）等，以及特定区域如贵州（丁道谦，1942）、云南（张肖梅，1942）、四川（李紫翔，1946）、重庆（付润华和汤约生，1945）和西北地区（建子，1944）的工业发展。

## 四、后来者的历史研究：史料整理与评价

### （一）是什么？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弄清楚“是什么”始终为其重要使命之一。从这一点上讲，当代学者对战时后方工业的研究与民国时期学者多有重合的部分。特别地，当研究涉及战时工业的整体概况、区域布局以及某些具体行业（如机器工业、化学工业）和省份（如四川、重庆）时，这种重合就更加明显了。可以说，当下文献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更多的是对某些细节的修补。然而作为后来者的历史学家，可以比亲历者拥有更宽广和完整的视野，在以下几个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其一，兵器工业。或许出于保密的原因，我们很少在民国时期学者的著述中看到关于兵器工业的研究，而这种限制并不存在于当代学者之中。根据《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等资料，学者们整理了战时后方兵工企业的分布和生产情况（王德中和程树武，1988；蒋仕民，1995；戚厚杰，2003；张守广，2015），还有一些文献专门研究某个省份战时的兵器工业，不过内容仍以布局和产品为主（田霞，2002；戚厚杰和奚霞，2005；刘国武，2009；王兆辉和张亚斌，2014）。另外也有学者研究了后方兵工产品的技术改良问题（曹敏华，2003；王安中，2009）。

其二，个案研究。当代学者丰富的个案研究是对过去文献有效的补充。如张守广（2015）考察了中国兴业公司、中国植物油料厂股份有限公司等官商合办企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状况；景占魁（1991）研究了“西北实业公司”在战时的发展情况；张圻福和韦恒（1990）研究了战时的刘鸿生企业；薛毅（1993）讨论了中福公司在战时的发展情况。

其三，资本与产权。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来自许涤新和吴承明（2007），他们利用档案数据测算了1938—1945年经济部对工矿业的投资情况，研究中对各年物价进行了平减，因此计算的投资额度更能反映战时的真实情况；丁日初和沈祖炜（1986）专门讨论了抗战时期的国家资本；吴太昌（1987）则是依据详尽的统计数据做了国营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比较研究；郭红娟（2007）与王红曼（2007）分别讨论了资源委员会和四联总处的投资；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讨论了战时典型企业的融资及股权情况（朱海嘉，2015；卢征良，2017）。

其四，中东部地区。在地域方面，由信息获取所限，民国时期的学者更加关注后方的工业发展，以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甘肃等省份的研究居多；当下的学者则将目光转移到中东部省份的非沦陷地区，并进一步考察战争对这些地区的工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已有文献所涉及的区域包括浙江（张根福，1999；袁成毅，2003）、广东（黄菊艳，2000）、江西（刘莉莉，2001；刘义程，2010）、湖北（徐旭阳，2005）以及东南（游海华，2015；游海华，2017）和华北（汪敬虞，2009）等大区。

### （二）受什么影响？

前文介绍了既有文献关于战时后方工业基本情况的研究，本部分主要综述到底哪些因素影响了战时后方工业的发展。被学者们提及最多的是国家政策，然而该变量被认为是既促进又阻碍了后方工业的发展。在促进方面，主要是《西南和西北工业建设计划》《非常时期矿业奖励暂行条

例》《经济部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核定厂矿请求协助借款原则》等法规条例的出台给予后方兴办工业以支持（王同起，1998；江沛，2005）。另外以四联总处、资源委员会<sup>①</sup>为代表的国家机构也为后方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丁日初和沈祖炜，1986；董长芝，1997；刘祯贵和侯德础，1997；王卫星，1997；虞和平，2006）。李云峰和曹敏（2003）认为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显著促进了西北地区工业的发展。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战时统制经济的实施也被认为有效地支持了后方工业的发展（刘殿君，1996；陈雷，2008）。然而不幸的是，政府积极作为似乎很难持续，在抗战后期，限价、产品专卖、统购统销、增加税负等一系列政策直接造成了后方工业的衰落（戴鞍钢，2006；吴仁明，2011）。在微观领域，官僚机构频繁干预企业经营管理，使其效率低下（卢征良，2017）。旧中国国家政权与近代资本主义技术的结合缺乏根本的经济动力（蒋仕民，1995）。

除了政策，战争本身就是影响后方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同样包含正反两个方面的效应。抗日战争增加了工业品的需求，同时由于战争塑造的封闭经济环境隔绝了国外替代品的竞争，使这些需求可以直接刺激后方本土工业的发展；战争还为后方地区带来了大量沿海的技术人才，形成可观的人力资本，大量移民的涌入增加了劳动力供给，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要素（黄立人，1985；林建曾，1996；戴鞍钢，2006）。此为正面效应。在另一个维度，战争导致后方工厂的布局违背了经济规律，降低了生产效率（张守广，2015）；战争的破坏降低了社会的购买能力，抑制了后方工业的发展（汪敬虞，2004）。同时，战局的变化使工厂频繁搬迁，也不利于后方工业的发展（游海华，2017）。

社会制度也带来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抗日战争激化了民族矛盾，降低了阶级矛盾，缓和了劳资关系从而促进后方工业发展（黄立人，1985）；然而，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属性阻碍了后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黄立人和张有高，1991）。最后，工业团体的组建（张守广，2015），工合运动的开展（田霞，2002；刘国武，2009），后方战前的工业基础（黄立人，1994），企业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张守广，2005）和卓越的领导能力（游海华，2017）被认为显著促进了战时后方工业的发展。在战争快结束时，大量美货在中国市场上的倾销则加速了后方工业的衰落（黄立人，1994）。

### （三）影响了什么？

对于战时后方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学者们有更多的共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战时后方工业的发展显著改变了战前中国经济不均衡的格局，有效地刺激了重庆、桂林、昆明、贵阳等西部中心城市的工业化发展，进一步缩小了东西部的差距（蒋仕民，1995；李云峰和曹敏，2003；江沛，2005）。游海华（2017）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不仅是全国，东南地区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也因为东部省份后方的工业发展而改变。工业发展还孕育了一个自然的结果，那就是促进了后方各地的城市化与商业繁荣，加速了其现代化过程（忻平，1995；刘国武，2009；刘国武和李朝辉，2015）。与此同时，后方工业的发展还提高了工人的生产技术、改进了生产设备，促进新产品的研发并建立了一批具有现代化管理经验的工业企业（林建曾，1996；戚厚杰和奚霞，

---

<sup>①</sup> 学界对资源委员会的评价并不一致，如吴太昌（1987）就这认为资源委员会的工业管制是失败的。

2005；王安中，2011）。军事工业的发展有效支持了正面战场（陆大钺，1993；田霞，2002）。然而，也有学者提醒到，战时后方工业虽较战前有了快速的发展，但其成就也不应太高估。事实上除了兵器工业，全国工业布局结构在战后并未有太大的改变（黄立人，1994；汪敬虞，2004），随着战后工厂复员，后方的工业又衰落下去了（林建曾，1996；戴鞍钢，2006；王安中，2011）。

以上研究皆是陈述了战时后方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现实影响，还有一些学者从中总结了其带来的理论意义。戚厚杰（2003）从后方军事工业入手，认为战时后方经济呈现了一种先军事化后重工业化的新型发展模式。张守广（2015）则认为战时后方是在统制经济名义下，一方面维持私有制，另一方面又实行计划经济来发展国家资本，推进国家工业化，算是一种工业化道路的尝试。

## 五、进一步的讨论：解读传统和解释传统

社会科学的认识方法有两个传统：解读传统和解释传统。解读传统的目的在于理解一些人类活动在一定文化条件下的内在含义；而解释传统的目的则在于寻找事物或事件中的因果联系。从上文所涉及的文献来看，几乎所有的作者都遵循着解读传统的研究范式，即依靠翔实的史料讲出一个故事或者是对故事的背景作出某种注解。然而，正如赵鼎新（2004）所指出的，解读方法唯一可遵循的是一致性原则，即通过叙事逻辑的内在合理性来评判一个解读的质量，但这种原则没有比较方法提供经验与逻辑保障，因而无法证伪，作为弥补，遵循这一范式的学者们通常会对所观察的事物进行一种全景式解读，即将所有与主题相关的内容都纳入书写框架之中（赵鼎新，2004）。这一背景下，寻找更多史料便成为一项无法回避的任务，因为正是各种档案材料构成了全景式解读的基础。例如，李平生（1996）所著《烽火映方舟——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一书几乎涵盖了大后方经济的主要方面，包括战时经济政策，大后方的财政金融、工矿交通、农业、商业贸易，对敌经济战等等；又如黄立人（1994）在《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的考察》中，就是沿着工厂内迁问题的提出以及内迁的开始、高潮、完成和余波的顺序，给出了工厂内迁的最完整图景；同样，林建曾（1996）在《一次异常的工业化空间传动——抗日战争时期厂矿内迁的客观作用》一文中也几乎讨论了全面抗战时期工业内迁的所有相关要素，包括资产的传动、资金的传动、技术的传动和市场的传动等。全景式解读甚至影响了学术综述的写作，本文前述所列举的三篇综述文章便是一例。在对学术史进行回顾时，作者期望纳入所有与主题相关的重要文献，而对这些文献观点的讨论以及对论证方法的批评却鲜有提及。事实上，当我们在研读过去文献时已经发现，学者们对很多问题都持有不同观点，有时甚至还是完全对立的观点，但遗憾的是，却并没有文章专门就这类竞争性假说展开讨论。我们猜测，解读传统在该研究领域的盛行可能是其重要原因。那些相悖的观点往往是基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的，而探索事物间的因果关系是以实证主义方法为核心的解释范式所关注和擅长的，故而那些竞争性观点就这样在解读传统下被忽视掉了。作为对过去综述文献的一种补充，我们将有关抗战时期后方工业发展的部分竞争性假说总结出来，列在表1中。

表1 全面抗战时期后方工业发展的竞争性假说

竞争性假说	代表文献	主要观点
假说 1: 国民政府在企业内迁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支持: 周天豹等 (1986) 赵德馨等 (1988) 江满情 (2009)	国民政府的内迁政策经历了由劝导、资助到强制的转变, 充当了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是有计划、有步骤
	反对: 黄逸峰 (1990)	对工厂内迁缺乏通盘的计划和周密的措施, 特别是对民营工厂内迁缺乏实际帮助, 导致大量工厂没有及时迁出
假说 2: 企业内迁极大地促进了后方工业发展	支持: 李云峰和曹敏 (2003) 江沛 (2005)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 大量生产物资、技术工人的内迁以及政府的相关金融补贴政策都极大地促进了后方工业发展
	反对: 黄立人 (1994) 汪敬虞 (2004)	全面抗战时期的工业产出虽然有所增加, 但生产力却普遍衰退; 除去军工产业, 全国工业布局在战后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假说 3: 经济统制政策对战时后方工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支持: 丁日初和沈祖炜 (1986) 刘殿君 (1996) 王同起 (1998)	全面抗战时期的经济统制政策符合战时的需要, 这种管制也是特殊背景下国民经济运转的必要条件, 它为快速恢复生产, 支持正面战场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 国家资本对经济的统制也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
	反对: 黄立人 (1985) 黄逸峰 (1990)	民国政府的限价以及统购统销等经济政策使得官僚资本在其中大量渔利, 而民营工业的发展则受到诸多限制, 处于破产的边缘
假说 4: 战争促进了后方工业发展	支持: 林建曾 (1996) 戴鞍钢 (2006)	战争增加了工业品需求, 同时战争隔离了竞争者的工业产品, 有利于后方民族工业的发展; 技术人员和劳动力的迁移, 为后方工业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本
	反对: 汪敬虞 (2004) 张守广 (2015) 游海华 (2017)	战争导致后方工厂的布局违背了经济规律, 降低了生产效率; 战争的破坏降低了社会的购买能力, 抑制了后方工业的发展。同时, 战局的变化使工厂频繁搬迁, 也不利于后方工业的发展

有部分文献对表 1 中的竞争性假说给出了分析, 有趣的是, 这类意见依然遵循着解读传统。例如黄逸平和李娟 (1993) 就认为, 学者们之所以对国民政府在工厂内迁中的作用认识不一致, 是因为掌握的档案材料不够全面, 若想能够澄清此类问题, 需要更加广泛搜集资料, 作全面的考察。然而事实却是, 即使找到更多的档案资料, 也无法轻易地对上表中的假说给出逻辑一致的回答。从方法论上讲, 简单的归纳法并不必然保证我们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只有对文本的解读, 而没有验证逻辑自洽的有力工具, 那么隐含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便很难被真正识别出来。史

料的收集与整理当然有利于增加我们对某个问题的认识与理解，它同样也是构建抽象理论所必不可少的现实材料，然而，试图完全从可观察到的历史事实去总结出抽象的规律是不够的，或者说不完全的，很多时候恰恰相反，是先行的理论决定了我们将观察到何种事实。以假说1为例，反对者以大量工厂没有及时迁出的事实去论证国民政府的组织失败显然失之偏颇，因为突发的战事、日军的封锁以及民营企业家自身的犹豫都可能导致这一结果出现；同样，若以大量重要工业企业顺利内迁至后方去论证国民政府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会存在问题，因为其中许多爱国企业家的自主内迁行为也对这一结果产生了影响。如果没有合适的分析工具或者说实证方法去剥离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的诸多其他因素，我们便不能准确地判断出国民政府的组织协调与工业企业内迁的因果关系。同样的道理，在解读传统下，我们也很难回答假说4提出的命题，即战争是否对后方的工业发展产生了正面影响；进一步地，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种影响有多大呢？而在解释传统的范式下，诸多分析工具便可派上用场。针对这一类外生冲击问题，最常用的识别策略是构建一个计量模型，通过反事实检验去考察战争到底是否带来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当然，认识到解释传统在识别因果关系方面所具备的优势，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放弃解读传统。事实上，任何解释离开解读都是没有意义的，任何简单的因果关系只有纳入大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之中，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这一因果关系所具备的社会含义。

## 六、关于拓展研究的思考

正如在前文中看到的那样，对于抗战时期后方工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学者们做了比较详尽的考证与分析，为我们呈现出比较清晰的图像。可以说，史实的描述已比较完善，进一步的工作可能在于继续增加工业企业和企业家的个案研究，对后方某省份具体县市的研究，对某一具体工业行业的研究等等。更多的细节当然有助于我们从中抽象出特征事实，从而加深对抗战时期后方工业状况的理解以及它在历史长河中的特殊地位。然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案例分析的一个显著弱点是无法回避特殊性的质疑，由于存在过度拟合的风险，其给出的结论缺乏一般解释力。在质性研究方面，学者们往往倾向于做静态分析，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比较静态和动态分析。关于比较静态分析，过去的文献做的较多的是比较战前和战时后方的工业情况，而对战时和战后后方工业的比较相对缺乏。不知是否受历史学科断代史划分方法的影响，我们几乎没有发现有文献将1949年前后的西部工业进行比较。事实上，抗战时期工厂内迁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有着非常高的可比性，二者都是在战争背景下实施的（前者基于现实的战争，后者基于可能的战争），都涉及工厂和人口的大规模迁移，都以重工业为主等等。但此类比较研究仍难得一见。跨区域的比较分析同样稀少，例如同样作为抗战大后方，重庆和昆明、贵阳和兰州的发展路径有着怎样的相似性和差异？另外，同样都是外生冲击的结果，鸦片战争后口岸的开放所导致沿海地区工业的兴起与抗日战争中西部地区工业的繁荣又有着怎样的异同呢？在动态分析方面，过去的文献仅在战时后方工业产品数量、工厂数量、资本和工人规模等少数变量上考虑了其在连续时间序列上的变化，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则很少有人关注。1937—1945年全面抗日战争阶段，特殊的外部环境使国民党政府采取了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战略，强调国家对整体经济的管制，实施

限制价格、统购统销措施以维持对正面战场的支持。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从1949—1978年，新中国采取了非常类似的发展策略，通过计划经济手段迅速推进了国家的重工业建设，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打下了坚实基础。究竟什么原因使得相似的政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时期）取得了不同的发展绩效呢？这将也会是一个十分值得探寻的问题。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解释与解读之间应有一个平衡点，使得我们的研究结论更具理性上的说服力和经验上的有效性。然而，当具体到全面抗战时期的经济研究时，现实的情况却是基于解释范式的实证研究太过稀少了，绝大多数文献的工作都是通过史料的挖掘来展示历史事实，而对内嵌于事实中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却疏于讨论和分析。就人类历史而言，战争并非偶然事件，国外已有许多学者通过可得的数据来建立计量模型以研究战争的长期影响。例如Acemoglu等人（2011）研究了法国在18世纪入侵德国所带来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未被法国直接占领的南部地区，那些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西部地区经历了更显著的经济增长，特别在1850年以后，该效应更加显著；Dincecco和Prado（2012）发现，对于前现代国家而言，对外扩张往往需要增加税收以负担战争的消耗，这一做法促进了国家的金融创新，其结果是促进了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Voigtländer和Voth（2013）认为欧洲国家之间频繁的战争是导致“大分流”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在16、17世纪的欧洲，战争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死亡（战死或死于由战争带来的瘟疫）却并没有杀死资本，被抬高的资本与劳动比让幸存者过上了更高质量的生活，也更有助于其逃离马尔萨斯陷阱；Davis & Weinstein（2002）与Miguel & Roland（2006）对20世纪日本和越南的研究发现，那些在战争中遭受美国炸弹重创的地区并未出现持久的负面影响，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地区往往比战前拥有更快的人口和经济增长速度；当文献一再强调战争通过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发展产生正面影响时，其带来的直接投资效应似乎并未发挥显著作用，例如在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工业品的需求大大增加，这刺激了政府对美国南部地区的投资，Jaworski（2017）的研究却表明，这种投资与该地区随后制造业的增长并无太大关联。上述研究的一个共同点是均采用了实证主义方法，因而其研究结论在逻辑上更有保障。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不考虑研究方法，这类文献所关心的问题也是国内学界少有提及的。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抗日战争在中国持续了14年之久，它是否也如这些外文文献所提示的那样，也对当下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呢？如果有，这些影响又包含哪些内容呢？进一步地，这种长期效应又是通过何种机制发生作用的呢？在所能找到的文献中，我们仅发现王鑫等（2021）做了类似的尝试，他们通过搜集整理各种史料，构建了支撑实证研究的县级工业数据库，计量模型的结果表明，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地区的工业投资通过路径依赖和初始物质资本积累对长期经济发展产生了正向影响。历史上工业投资越高的地区，其当下的工业化程度也越高，但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并没有显著差别。就本文所讨论的主题而言，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不仅可以保证逻辑的严谨性，还能引导我们去探讨传统史学较少涉及的选题，例如抗日战争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等等。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过度细分的学科分类也许是制约我们研究的又一障碍。对抗战这一主题的探讨仿佛只是历史学的任务，<sup>①</sup>其他学科鲜有涉足。未来的研究中，根据学科门类来划分研究领域的做法

---

<sup>①</sup>更多时候，这一主题仅是属于抗战史的领域，其他方向的历史学者也很少涉猎。

或许将不再成为主流，取而代之的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划分方法，根据不同的问题，我们可以使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地理学等不同的分析方法。当然，跨学科的合作也将会受到更多重视，也只有当各学科的优势在研究中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我们才能对某一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 参考文献

- 曹敏华，2003：《论抗战时期后方冶金工业建设对军事工业发展的影响》，《东南学术》第5期。
- 陈雷，2008：《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 戴鞍钢，2006：《抗战时期中国西部工业的转机和困顿》，载自朱荫贵、戴鞍钢，2006：《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 丁道谦，1942：《贵州的工业建设》，《中国工业（桂林）》第4期。
- 丁日初、沈祖炜，1986：《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第4期。
- 董长芝，1997：《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金融体制》，《抗日战争研究》第4期。
- 刘祯贵、侯德础，1997：《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四联总处的工矿贴放政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方显庭、顾浚泉，1941：《中国工业上的几个问题》，《西南实业通讯》第5/6期。
- 付润华、汤约生，1945：《陪都工商年鉴》，文信书局。
- 顾葆常，1948：《十年来之化学工业》，中华书局。
- 郭德文、孙克铭，1946：《抗战八年来之电器工业》，《资源委员会季刊》第6期。
- 郭红娟，2007：《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重工业建设的资金动员》，《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
- 黄菊艳，2000：《抗战时期广东省营工业的损失与重建》，《民国档案》第2期。
- 黄立人，1985：《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开发西南的历史评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4期。
- 黄立人，1994：《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的考察》，《历史研究》第4期。
- 黄立人、张有高，1991：《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兵器工业内迁初论》，《历史档案》第2期。
- 黄逸峰、姜锋、唐传泗、徐鼎新，1990：《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
- 黄逸平、李娟，1993：《抗日战争时期经济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
- 建子，1944：《西北民营工业概观》，《西南实业通讯》第3期。
- 江满情，2009：《抗战时期民营工厂内迁新论》，《近代史学刊》第2期。
- 江沛，2005：《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变动的三大特征》，《南方论丛》第3期。
- 蒋仕民，1995：《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兵工生产》，《军事经济研究》第7期。
- 景占魁，1991：《阎锡山与西北实业公司》，山西经济出版社。
- 李承三，1943：《从地理环境论西北建设》，《中央周刊》第29期。
- 李平生，1996：《烽火映方舟——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云峰、曹敏，2003：《抗日时期的国民政府与西北开发》，《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

- 李紫翔, 1945a :《大后方工业的发展》,《经济周报》第1期。
- 李紫翔, 1945b :《大后方战时工业鸟瞰》,《经济周报》第1期。
- 李紫翔, 1945c :《我国战时工业生产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2期。
- 李紫翔, 1945d :《战时工业资本的估计与分析》,《中国工业(桂林)》第32/33期。
- 李紫翔, 1946a :《大后方的国营工业》,《经济周报》第2期。
- 李紫翔, 1946b :《四川战时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1期。
- 林继庸, 1942 :《民营厂矿内迁纪略》,星星出版社。
- 林建曾, 1996 :《一次异常的工业化空间传动——抗日战争时期厂矿内迁的客观作用》,《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
- 刘大钧, 1942 :《我国工业建设之方针》,《经济建设季刊》第1期。
- 刘殿君, 1996 :《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统制》,《南开经济研究》第3期。
- 刘国武, 2009 :《抗战时期湖南的工矿业》,《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
- 刘国武、李朝辉, 2015 :《抗战时期的湘西工业区》,《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
- 刘莉莉, 2001 :《近代江西工业化的“黄金时期”: 1938—1943》,《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刘义程, 2010 :《抗日战争时期江西工业发展考察》,《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
- 卢征良, 2017 :《抗战时期大后方省营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内部权力分配问题——以川康兴业公司为中心的分析》,《民国研究》第1期。
- 陆大钺, 1993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兵器工业》,《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
- 罗敦伟, 1940 :《西南经济建设与计划经济》,《西南实业通讯》第3期。
- 马雄冠、叶竹, 1943 :《后方民营机器工业过去及现在概况》,《西南实业通讯》第1期。
- 欧阳仑, 1948 :《十年来之机器工业》,中华书局。
- 戚厚杰, 2003 :《抗战时期兵器工业的内迁及在西南地区的发展》,《民国档案》第1期。
- 戚厚杰、王德中, 1993 :《抗日战争时期兵器工业的内迁》,《军事历史研究》第2期。
- 戚厚杰、奚霞, 2005 :《抗战中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的形成及意义》,《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
- 齐植璐, 1943 :《由地理观点论西北西南之经济依存关系》,《新经济》第5期。
- 任扶善, 1940 :《战时技工缺乏的对策》,《新经济》第10期。
- 沈雷春、陈禾章, 1941 :《中国战时经济志》,中国金融年鉴社。
- 孙果达, 1985 :《抗战初期上海民营工厂的内迁》,《近代史研究》第4期。
- 孙果达, 1991 :《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中国文史出版社。
- 孙玉声, 1946 :《抗战八年来之电气事业》,《资源委员会季刊》第1/2期。
- 谭熙鸿, 1948 :《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中华书局。
- 田霞, 2002 :《抗日战争时期陕西工业发展探析》,《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
- 汪敬虞, 2004 :《中国工业生产力变动初探(1933—1946)》,《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
- 汪敬虞, 2009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沦陷区工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
- 王安中, 2009 :《国民政府军事工业研究》,上海大学博士论文。

- 王安中, 2011:《抗战时期湖南工矿业发展趋势新探》,《湖南社会科学》第2期。
- 王德中、程树武, 1988:《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军事工业》,《中州学刊》第5期。
- 王红曼, 2007:《抗日战争时期四联总处在西南地区的工农业经济投资》,《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王同起, 1998:《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经济体制与政策的调整》,《历史教学》第9期。
- 王卫星, 1997:《资源委员会与战时国防重工业建设》,《抗日战争研究》第4期。
- 王鑫、庞浩、白极星、齐秀琳, 2021:《工业投资的长期效应——来自抗日战争的证据》,《财经研究》第3期。
- 王兆辉、张亚斌, 2014:《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兵工生产情况述论》,《云南开放大学学报》第2期。
- 王子祐, 1946:《抗战八年来之我国钢铁工业》,《资源委员会季刊》第6期。
- 魏宏运, 1999:《抗战初期工厂内迁的剖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 翁文灏, 1940:《西南经济建设之前瞻》,《西南实业通讯》第3期。
- 翁文灏, 1941:《经济部的战时工业建设》,《中央周刊》第3期。
- 吴景超, 1943:《中国应当建设的工业区与工业》,《经济建设季刊》第4期。
- 吴景平、王征, 1999:《抗战时期经济研究50年》,《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
- 吴仁明, 2011:《抗战时期大后方民营工业兴衰及其与政府关系述论》,《江汉论坛》第5期。
- 吴太昌, 1987:《抗战时期国民党国家资本在工矿业的垄断地位及其与民营资本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
- 忻平, 1995:《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上海党史与党建》增刊第1期。
- 徐旭阳, 2005:《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工矿业开发建设述论》,《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许涤新、吴承明, 2007:《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出版社。
- 薛毅, 1993:《抗战期间的英商福公司》,《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
- 薛毅, 2005:《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述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杨菁, 2000:《四联总处与战时金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 游海华, 2015:《抗战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抗日战争研究》第1期。
- 游海华, 2017:《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东南区域工业发展考察》,《学术月刊》第5期。
- 虞和平, 2006:《抗战时期后方的金融、财政及投资》,载自朱荫贵、戴鞍钢, 2006《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 袁成毅, 2003:《区域工业化进程的重创:抗战时期浙江工业损失初探》,《浙江社会科学》第4期。
- 张根福, 1999:《抗战时期浙江各地迁设丽水地区的工厂及其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张国瑞, 1939:《开发资源与西南新经济建设》,中国建设出版社。
- 张圻福、韦恒, 1990:《火柴大王刘鸿生》,河南人民出版社。
- 张守广, 2005:《抗战时期后方地区大中型企业的兴起与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期。

张守广, 2012:《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 重庆出版社。

张守广, 2015:《筚路蓝缕:抗战时期厂矿企业大迁移》, 商务印书馆。

张肖梅, 1942:《云南经济》,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

张肖梅, 1945:《对开发西南实业应有之认识》,《工商界(重庆)》第5期。

赵德馨, 1988:《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赵鼎新, 2004:《解释传统还是解读传统?——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出路何在》,《社会科学文摘》第6期。

郑起东, 2008:《1995—2005:抗日战争时期经济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

周天豹、凌承学、黄立人、杨安勤、唐乃康、黄泓、徐彦波, 1986:《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工业发展考察》,《开发研究》第2期。

朱海嘉, 2015:《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民营电力的资本介入——以重庆电力公司融资为例的考察》,《近代中国》。

诸葛达, 2001:《抗日战争时期工厂内迁及其对大后方工业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Acemoglu, D., D. Cantoni, S. Johnson, and J. A. Robinson, 2011, “The Consequences of Radical Reform: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7), 3286–3307.

Dincecco, M., and M. Prado, 2012, “Warfare, Fiscal Capacity,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7(3), 171–203.

Miguel, E., and G. Roland, 2006, “The Long-Run Impact of Bombing Vietna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6(1), 1–15.

Voigtländer, N., and H. J. Voth, 2013, “Gifts of Mars: Warfare and Europe’s Early Rise to Rich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4), 165–186.

Davis, D. R., and D. E. Weinstein, 2002, “Bones, Bombs, and Break Points: The Geography of Economic Activ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5), 1269–1289.

Jaworski, T., 2017, “World War II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South”, *NBER Working Paper*.

## Out of the “Panoramic Narrative” : Studies on the Internal Relocation of Enterpris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WANG Xin GUO Yuxuan WANG Haiying

Abstract : The reloc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ar-area industries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theme in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This paper undertakes a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to this topic. First,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factual descriptions and causal inferences in the existing panoramic narrative literature, it finds that while the

former has reached relatively stable consensus, the latter lacks systematic tests of competing hypotheses. Second, through a review and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the literature, the paper organizes and standardizes several core competing propositions along the lines of “what happened–what influenced it–what impact it produced,” and assesses, from a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applicability and complementarity of the interpretive tradition and the explanatory tradition. Finally,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factual accounts regarding the periodization of enterprise relocati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ilitary and private firm migration routes, and the industrial geography of western China are relatively well established, with future contributions expected at the level of micro–cases and region–industry specificities. At the same time, evidence remains insufficient on whether wartime demand, state control policies, an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generated long–term effects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rear areas, calling for further validation through digitized historical data, county–level databases, and rigorous identification strategies. Looking ahea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adopt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advance dynamic perspectiv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achieve a paradigm synthesis of interpretation and explanation, thereby offering causal explanations and mechanism–based insights in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experience of wartime China.

Keywords :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Inward Relocation of Enterprise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Rear

【责任编辑：严若谷】